

當前中國大陸農村形勢的探討

施哲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 壹、前言
- 貳、中國大陸農業生產形勢
- 參、糧食問題
- 肆、農村的勞動力
- 伍、鄉鎮企業的現況與發展
- 陸、農民的收入與負擔
- 柒、黨群與幹群關係
- 捌、農村社會的治安問題
- 玖、結論

壹、前言

鄧小平已年過九十，最後一次出現在媒體上已是不良於行，須人攙扶，顯示老態龍鍾的形象，加上不時傳出他健康惡化，中共又忙着闢謠的訊息。因此，鄧後中國大陸形勢的演變，成為當前世人矚目的焦點。

穩定與發展是當前中共強調的兩大主題，兩者之間的關係極其密切且互為影響，穩定是發展的基礎，發展是穩定的條件，鄧小平對此表示：「一旦不穩定甚至動亂，什麼建設也搞不成」。^①農業的發展情況是大陸能否穩定的關鍵基礎所在，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散佈遼闊的農村和人口眾多的農民，是中國自古至今的基本國情，農村形勢的發展關係到每一朝代的治亂興衰，中共對此亦有深刻地認識，鄧小平曾深切地說：「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全，中國經濟

① 鄧小平，「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頁三五二。

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②因而喊出「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口號，進而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經驗建設方針。

然而，以「土地革命」為號召，依靠農民取得政權的中共，四十餘年來，對大陸農村的環境與農民的生活並無多大的改善，特別是前三十年，因中共一連串的錯誤政策，導致農業生產一直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了三年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農村也長期陷於貧窮落後的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的產量大幅提高，農民生活亦大為改善，一九八四年糧食產量會創下歷史的最高點。至此，中共誤以為糧食產量不僅能自給自足，且未來還有出口的可能，農村問題也迎刃而解，因而對農業問題並未給予應有的重視，逐年減少在農業方面的投資，工農業的剪刀差亦不斷擴大，各種苛捐雜稅紛至沓來，收購糧食又常以「白條」代替現金。於是，從一九八五年起糧食產量連續四年出現徘徊的現象，城鄉收入差距再度拉大，農民增產而不增收，幹群關係日益緊張，一九九三年十月終於爆發了四川省仁壽縣的農民抗暴事件。

鑑於農業生產各種條件的日漸薄弱，農村人口增長對糧食和就業所造成的壓力，城鄉差距的日益擴大，以及農村各種矛盾的益趨緊張，此一形勢引起中共中央嚴重的關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一九九三年十月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表示：這將「嚴重影響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的安定」。^③英國的泰晤士報也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報導，一旦鄧小平去世後，中國大陸會發生暴民革命，危及中共的政權。^④

鄧後大陸社會能否穩定實與大陸農村未來形勢的發展狀況息息相關，中國大陸農村形勢的發展，又受下列諸因素的影響：農業生產的形勢、糧食的問題、農村的勞動力、鄉鎮企業的現況與發展、農民的收入與負擔、黨群與幹群的關係和農村社會的治安問題。本論文將從以上諸方面分析目前的現況和未來發展可能出現的問題。

貳、中國大陸農業生產形勢

一、農業基本建設投資

- ② 鄧小平，「我們的宏偉目標和本政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頁七七、七八。
- ③ 明報，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九日。
- ④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中共政權成立後，採取了史大林經濟模式——指令式社會主義體制，此一模式的特點之一在於重視工業，輕視農業，此種發展策略必然會導致工農業投資比例的嚴重失衡，基本建設投資結構表見下頁（表一），大陸各時期的工農投資比例如下：

⑤

- ② 鄧小平，「我們的宏偉目標和根本政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頁七七、七八。
- ③ 明報，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九日。
- ④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中共政權成立後，採取了史大林經濟模式——指令式社會主義體制，此一模式的特點之一在於重視工業，輕視農業；此種發展策略必然會導致工業投資比例的嚴重失衡，基本建設投資結構表見下頁（表一），大陸各時期的工業投資比例如下：

時期	一五	二五	調整期	三五	四五	五五	六五	七五
工業投資比	六·〇比一	五·三比一	二·八比一	五·二比一	五·七比一	五·〇比一	八·九比一	一五·七比一

由此一表列平均各時期工業投資比例為七·八比一，顯示中共在國家基本建設的投資產業，數十年來一貫地向工業傾斜，自然反映在工業的增長率，造成明顯的差距，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的「一五」期間，中共集中建立了重工業體系，「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七點八，農業、工業分別增長百分之二十四點八和百分之一百二十八點六，其中重工業增長百分之二百一十點七」。^⑤

農業的成長率原就落後於工業的成長率，加上中共又以「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業部門擠壓資金，以作為發展工業之用，前三十年累計約六千億元，平均每年為二百億元，相當於此段期間中共國家基本建設的總投資額。改革開放以來，「剪刀差」雖一度縮小，但後來卻變本加厲，「一九七八——一九九一年，全國『剪刀差』累計高達一二三五九·五億元，相當於同期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一九八七年——一九九一年，每年絕對額高達一〇〇〇至一九〇〇億元，成倍高於改革開放前的數額」。^⑦

至於改革開放後農業基本建設的投資，佔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卻日漸降低，「一九七九——一九九二年，國家基本投資總額由五〇一億元增長到二九一一·四億元，增長了四·八倍，而農業基本建設投資額從五三·三億元增長到一一三·四億元，僅增長一·一倍，其比重則同期由百分之十點六下降為百分之三點九」。^⑧農業基建的投資更顯得不足。

此外，改革開放後隨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戶代替集體經濟組織成為生產資金的積累主體，因集體幾乎名存實亡，對農村的投資減少，與此同時，由於財政的「分灶」吃飯，地方政府短期性和趨利性明顯增強，導致政府對農業投入也隨之減少，而農戶也因分散，經營規模亦小，加上負擔又重，所以在農業的投資比重也日漸降低。由於投資嚴重向工業傾斜，「不僅農業基建投資少，而且整個支農基金、信貸資金、農業集體、農戶對農業全方位下降。財政支農資金的比重

- ⑤ 引自魏春奇，「談制度性勢差與我國農業政策取向」，農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四年第九期，頁七十三。
- ⑥ 雷寧志，「理論偏差——農民負擔根源探析」，農業經濟問題，北京：中國農業經濟學會，一九九四年第一期，頁三十八。
- ⑦ 同前註。
- ⑧ 張紅宇、顏榕，「國民經濟增長中農民收入的現狀與對策」，農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四年第七期，頁一五七。

當前中國大陸農村形勢的探討

則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十三點五，下降到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八點三。同時，為農業服務的農用工業投資也大幅度下降。一九五二——一九八〇年間全國農用工業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為百分之四點二，一九八〇——一九八五年下降為百分之一點三。^⑨

在投資不足，農業又因價格偏低而缺乏自我投入能力的情况下，使整個農業基礎超負荷運轉，功能急劇減弱。根據中共有關部門調查，「五〇——七〇年代興建的農業水利設施，相當部分因長年失修已喪失正常運行能力。全國八·四萬座水庫中，約有三分之一屬於病險庫，不能滿負荷使用，水庫容量從八十年代初期的四五〇〇億立方米下降到目前只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間。由於水利保障程序下降，農業受災情況日益嚴重，全國每年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分別從八〇年代前期的三五〇〇萬公頃和一六〇〇萬公頃左右劇增到一九九二年的五一三三·三萬公頃和二五八九·五萬公頃；水土流失面積從八〇年代初期的一〇〇萬平方公里左右劇增到目前的一七〇多萬平方公里」。^⑩

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農業基本建設投資方面不增反降的情況顯示，一九八五年以後連續四年出現糧食徘徊的局面，以及至今農業發展一直無法快速成長，是其來有自的。未來如中共依舊輕視農業的基本建設工作，而冀望農業能快速成長，恐怕不易達成其願望。

在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導致大量的水利工程失修，灌溉面積減少。群眾說，我們是「五〇年代修塘、六〇年代修庫、七〇年代修渠，八〇年代吃老本」。目前大陸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水利設施不能

⑨ 龍緒豪，「九〇年代我國糧食生產的展望及戰略選擇」，財經科學，成都：西南財經大學，一九九一年第二期，頁十四。

⑩ 李曉明，「農業保護：市場經濟中政府的重要責任」，農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四年第九期，頁六一。

表一 基建投資結構(%)

時 期	農、輕、重比重 農 輕 重	農 業	能 源	運輸郵電	教 育
一 五	1:0.9:5.1	7.1	12.4	15.3	3.5
二 五	1:0.6:4.8	11.3	17.1	13.5	1.8
1963—65	1:0.2:2.6	17.6	15.1	12.7	2.6
三 五	1:0.4:4.8	10.7	15.9	15.4	1.3
四 五	1:0.6:5.1	9.8	17.6	18.0	1.6
五 五	1:0.6:4.4	10.5	20.9	12.9	2.2
六 五	1:1.4:7.7	5.0	20.4	13.3	5.4
七 五	1:2.3:13.4	3.3	27.5	1.0	8.1
1991	1:1.8:11.8	4.0	30.5	15.6	5.6
1992	1:2.0:11.1	3.7	26.7	114.9	5.0

資料來源：〈1950—1985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第78頁。

〈中國統計年鑑〉1988年，第570頁。

〈中國統計年鑑〉1993年，第149、158、159頁。

發揮正常效益，百分之七十的大中小水庫帶病運轉，全大陸二五五萬眼機井中，很多已淤塞無水。僅山東省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四年就報廢二八八〇〇眼。據統計，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全大陸灌溉面積每年純增加一五〇〇萬畝，一九八〇年代以

⑨ 前編，一九〇〇年中國糧食生產的展望及戰略選擇，見於科學，成者：西南財經大學，一九九一年第二期，頁十四。

⑩ 李曉明，「農業保護：市場經濟中政府的重要責任」，農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四年第九期，頁六一。

發揮正常效益，百分之七十的大中小水庫帶病運轉，全大陸二五五萬眼機井中，很多已淤塞無水。僅山東省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四年就報廢二八八〇〇眼。據統計，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全大陸灌溉面積每年純增加一五〇〇萬畝，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平均減少七〇〇萬畝。⑪

二、耕地與自然生態環境

耕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資料，其面積的大小及質量的優劣，制約着農業的生產。以佔世界耕地面積百分之七，要養活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二之中國大陸，原本壓力就很重，加上改革開放以來大陸耕地面積又日益減少，同時人口增長的勢頭也無法控制，此一形勢使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大陸耕地面積歷年來的演變和未來預測見（表二）與（表三）。

一九四九年大陸的耕地面積為一四·六八億畝，人均二·七畝。一九五七年耕地面積為一六·七七億畝，人均二·五九畝。其後，由於經濟建設不斷增加，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加之人口猛增，到一九八九年耕地面積已減少到一四·三五億畝，人均僅有一·三畝。四十年中，人均耕地減少了一半，且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不足一畝（主要是在氣候、水資源優越、勞力資源豐富、技術水平較高的南方）。⑫在一九九二年二月鄧南巡講話後，大陸各地更掀起一股開發熱潮，更造成耕地流失，當年全大陸的開發區、加工區、工貿區由上年的一一七個增至二七〇〇個。據調查，規劃開發區面積達一·五萬平方公里，國家建設占用耕地「七五」期間平均一三〇至一五〇萬畝，年遞增百分之廿一至廿五，一九九二年高達三〇〇萬畝，農民建房一直在一五〇萬畝上下擺動，隨着經濟形勢的加快，這種趨勢還要擴大。⑬

目前大陸耕地面積在冊數為一四·三五億畝，水旱地之比為一：三，有效灌溉面積不到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十，其中高產穩產田不足十分之一，而鹽鹼地、沼澤地、高寒地、紅壤地、水土流失地、風砂地及海灘等低產田有二·二五億畝，一九九三年人均耕地面積已降至一·二八畝，而且仍呈下降趨勢。相反地，人口卻還在上升，一九九四年已達近十二億，估計本世紀末將達十三億，屆時人均耕地面積只有〇·九五畝，許多省份將只剩〇·七五畝。按國際規定，耕地減少危險點為人均占有〇·八畝，這意味着到本世紀末大陸耕地減少的危險點即將來臨，據專家估計，大陸土地對人口的合理承載量為八億，最大理論承載量為十五億，而目前人口與耕地又出現反向發展，顯示了大陸耕地承載力是陷於危機的狀態之中。⑭

- ⑪ 陸學藝著，當代中國農村與當代中國農民，北京：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頁二五九。
- ⑫ 中國農業科學院區劃所耕地課題組，「我國耕地資源剖析」，農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四年第三期，頁十九。
- ⑬ 彭珂珊，「中國現階段的人口、土地、糧食、災害惡性循環與逆轉對策」，農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四年第八期，頁十九。
- ⑭ 彭珂珊，「中國耕地資源嚴重失衡與擺脫困境之途徑」，農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四年第七期，頁一四七。

當前中國大陸農村形勢的探討

時	其
一	五
二	五
1963—65	五
三	五
四	五
五	五
六	五
七	五
	1991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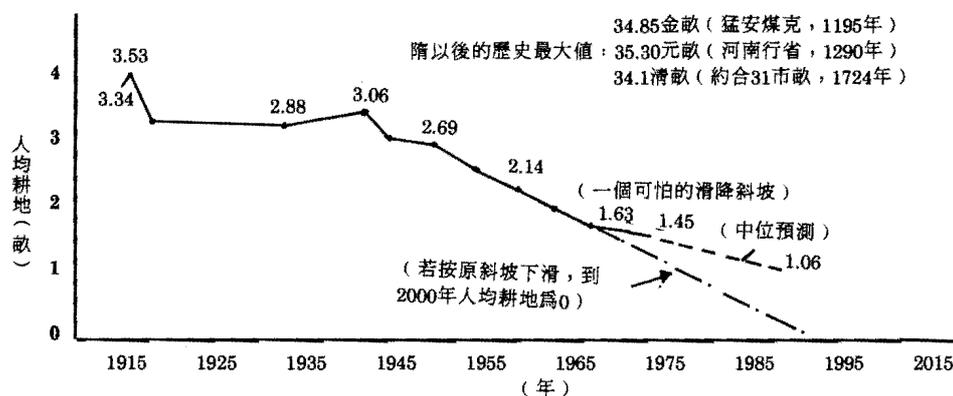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報〉
〈中國統計年報〉

表二 中國大陸耕地面積和人均耕地面積

年 份	耕地面積 (萬畝)	人均耕地 (畝)
1949	146,822	2.71
1952 (解放後)	161,978	2.82
1953	162,793	2.77
1954	164,032	2.72
1955	165,235	2.69
1956	167,737	2.67
1957	167,745	2.59
1958	160,351	2.43
1959	157,869	2.33
1960	157,292	2.37
1961	154,966	2.35
1962	154,355	2.29
1963	154,090	2.23
1964	154,968	2.20
1965	155,391	2.14
1966	154,437	2.07
1967	153,846	2.01
1968	152,330	1.94
1969	152,190	1.89
1970	151,702	1.84
1971	151,049	1.77
1972	150,922	1.73
1973	150,319	1.68
1974	149,863	1.65
1975	149,562	1.63
1976	149,082	1.59
1977	148,871	1.57
1978	149,084	1.55
1979	149,247	1.53
1980	148,958	1.51
1981	149,556	1.49
1983	147,910	1.45
2000	136,800	1.09
	142,800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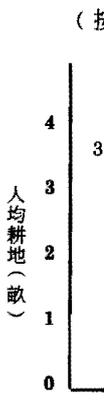
表三 1915-2000年中國人均耕地變化 and 預測

(按原統計數人均耕地到2000年接近1畝,按遙感資料估計也不會超過1.4畝)



導致大陸耕地面積日益縮減和土質逐漸劣化的因素，可歸納為已下幾項要點：⑮

年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導致大陸耕地面積日益縮減和土質逐漸劣化的因素，可歸納為已下幾項要點：^⑮

一、違法徵用土地：主要在經濟過熱發展，建設項目盲目推出，使違法占用耕地的趨勢日增。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和浙江杭甬一帶公路幹線兩旁，一些地方亂搞「沿路建設」，造成土地浪費現象驚人。

二、地方政府和領導幹部越權批地，黨政幹部違法占地建私房問題突出：在「有權不用，過時做廢」的心態下，中共的黨政幹部為圖享受，經常以權謀私，有些省份越權批地占地總數的百分之廿至四十，有些地方幹部違法占地建房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三、耕地剝蝕：大陸農民大部份只重視短期性貨幣化投入產出關係上，而常忽視長期土地生產能力的保養，因而大量施用化學肥料，其結果使得土壤的良性結構嚴重破壞，造成土壤板結、地力下降、保水、保肥能力衰弱。通過施化肥，補給土地的養份只有消耗量的一半，土壤有機質的歸還率還不到百分之五十。

四、水土流失：大陸每年入海泥沙占全世界入海泥沙的四分之一以上。黃河每年輸沙量為十六·四億噸，長江亦逐漸步黃河的後塵，每年有五億噸泥沙入海，全大陸的水土流失面積已占全部面積的六分之一，每年流失的土壤有五十億噸，相當於全部耕地被剝去一釐米厚的肥土層。

五、農民違法占地：在一九八八年農民違法占地事件中擅自占用土地的案件占百分之五十九·四。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有所改善，有些收入大為提高的農民，即占用土地大修祖墳，或是新蓋住房。

六、生態遭到破壞、土地劣化：大陸生態在中共以往大搞「毀林開荒」政策下，長期以來遭到嚴重破壞。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大陸被毀掉的森林超過十億畝，使森林覆蓋率降到剩百分之十二·五，只有世界水平的一半。在森林遭到破壞後，大陸土地沙化現象亦日趨嚴重，西北八個省區所形成的風沙線已達一百多平方公里，直逼大陸最著名的東北糧食金色玉米帶，形成寬兩里，長兩千里的風沙線，使西北地區兩百多個縣旗耕地銳減的勢頭更加咄咄逼人。此外，工業的廢水、廢渣、以及城市的垃圾糞便，對土地品質的劣化亦產生嚴重的影響，大陸污水排放為每年三百一十億噸，其中工業廢水占百分之七十七，生活廢水占百分之二十三，廢水處理僅達百分之十四，大部份未經處理便直接排放到水體中，隨水漂流，使所經之地遭到污染。城市的垃圾糞便每年為一億四千六百萬噸，其清運量不到一半，百分之九未經無害處理便進入環境。歷年堆積的固體廢棄物高達五十三億噸，占地五十九萬畝，其中四分之一為耕地面積。

七、耕地擱荒：從事糧食生產的收入在大陸各行業的收入排行中，是在最低的地位，近年來又由於化肥、農藥的價格不斷攀升，且不易買到，加上流通領域的混亂，農民屢遭盤剝，糧食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種地成了負擔，使一些農民意識到，

^⑮ 墨翼、志遠，「今後，中國人會餓死嗎？我們，只擁有這塊土地」，社會，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號，（總六十九期），頁三—四。

與其花那麼大的代價去種糧，不如放棄糧食，從事其它經營收入更高的行業。因此，摺耕現象十分普遍，有的則是放棄承擔的責任田，例如廣東省在近四年的其間丟荒廢棄的耕地達三十多萬畝。

三、農業科技

在大陸人口不斷增長，耕地面積卻逐年縮小的形勢下，唯有依賴農業科技的發展，以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才能解決人口與糧食之間日增的矛盾問題。

四十餘年來，大陸的農業科技雖有不少成就，對大陸今後農業的發展方向，中共也提出需依靠農業科技才能達成「雙高一優」（高產、優質、高效）的預期目標。然而，大陸整體的農業科研遠不敷農業發展的需要，目前更陷入技術資源遠遠落後的困境。

對農村人才的培養，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高等院校總共培養了四十三萬畢業生，加上農業中專八十三萬畢業生，農業科技人才有一百二十萬左右，但迄今流失的已達百分之六十九，剩下的四十二萬人中，在基層工作的不過十五萬人，每名農業人口中只有三、七名技術員，平均四七〇公頃耕地一人；一半以上鄉鎮無農業推廣站，三分之二的村落沒有技術服務組織；百分之七十的農業科技成果沒有推廣使用，^⑭此一情況是大陸農村經濟長期陷於停滯狀態的主因之一。

原本即遠不敷需求的大陸農業科技系統，目前又面臨「經費少、人心散、隊伍亂」的嚴峻局面。據一九九三年七月的最新統計，大陸縣一級農技推廣站中全部「斷奶」、「斷糧」的有三十九個、鄉級達一、三五萬個；調離縣級站的農技員有二四〇〇多人，調離鄉級的達一、三一萬人；財產被占用的縣級站和鄉級站分別有一〇九個和二二六〇個。在大陸率先完成建置縣級農技中心、鄉級農技站的寧夏自治區，現已陷入「網破、人散」的困境。^⑮

在「一切向錢看」和「全民經商熱」的浪潮下，加上部分地方明文規定：「涉農部門的經費一律在年初預算的基礎上壓縮百分之二十五，事業單位經費壓縮百分之二十五，實行撥改貸」；有的地方規定貸款二——三年，限期「斷奶」。因此，為「覓食謀生」，大量農技人員棄科從商，學非所用，揚短避長，農技站變成了飯館、商店，甚至歌舞廳者已不乏其例。有一個縣植保站五十餘人，現在只留三人搞防治、改良、推廣，其餘「啥掙錢就幹啥，各奔前程」；過去病蟲監測，最少一天，最長一周預報一次，全年印發七〇〇多份病蟲情報，如今沒錢「全免了」。^⑯

⑭ 汪洋著，中國十億人，海口：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頁九〇—九一。

⑮ 丁聲俊，「農業科技推廣工作不能削弱」，北京：經濟日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⑯ 同前註。

大陸農業的科研人員少，研究經費亦不足，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比，「發達國家農技推廣員與農業人口比例在一：一〇〇，大陸僅為一：一二〇〇；大陸農業

① 汪洋着，中國十億人，海口：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頁九〇—九一。
 ② 丁聲俊，「農業科技推廣工作不能削弱」，北京：經濟日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③ 同前註。

大陸農業的科研人員少，研究經費亦不足，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比，「發達國家農技推廣員與農業人口比例在一：一〇〇，大陸僅為一：一二〇〇；大陸農業科研投資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一九八〇——一九八六年僅為百分之〇·二七——百分之〇·一九，遠低於國外的百分之一·五——百分之二；科技推廣率低，僅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加上農民科技素質低，對科技成果本來就想用不敢用、敢用不會用」，^①如今再被「折廟」、「斷奶」，無異雪上加霜。在事業經費不夠，創收又困難的情況下，不僅農業科研人員待遇普遍低落，更使得整個農業科研工作難於開展，中共的「國家農科院，有的所竟只能發出百分之七十的工資，還有的所靠銀行貸款發工資」，過低的工資使「跳出農門」的科研人員劇增，「作物研究所有二十多位博士、碩士，出國後至今未歸。五十多歲的人流不動，守攤子，人雖然在搞科研，但心理也不平衡」。^②

在經費捉襟見肘，科研人員不斷流失，留守人員亦不安於位惡性循環的情況下，對農業服務工作的熱誠明顯地被削弱，無法有效掌握控制生產的有利條件，間接導致了大陸農村病蟲害的流行，嚴重影響了農業的生產力。

叁、糧食問題

糧食是關係國民生計的特殊商品，也是關係社會穩定的戰略物質，向來為世界各國所關注。對中國而言，此一問題的解決難度更高，因為大陸的耕地面積僅占世界的百分之七，而人口卻佔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二，此即表示中國吃飯問題的負荷，要比世界各國沉重至少三倍。大陸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七年糧食產量見（表四）。

從一九五三年起，中共採取「統購統銷」政策及使用糧票，以便能確實掌控

① 同前註。

② 劉路沙，「農業科研呼喚支持」，光明日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

當前中國大陸農村形勢的探討

表四 大陸糧食生產數字統計表（1978-1987）

年 期	糧食產量(萬噸)	較上年增長數(萬噸)	較上年增長比率
1978	30,477	-	-
1979	33,212	2,735	8.9%
1980	32,056	-1,156	-3.5%
1981	32,502	446	1.4%
1982	35,450	2,948	9.1%
1983	38,728	3,278	9.2%
1984	40,731	2,003	5.7%
1985	37,911	-2,820	-6.9%
1986	39,151	1,240	3.3%
1987	40,241	1,090	2.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7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頁一七〇。

糧食的需求，直到不久前才廢止。然因大陸糧食生產形勢不佳，去年初多個省市缺糧告急，糧價飛漲，人心不穩，搶購風潮一觸即發，經中共中央及時宏觀調控，平抑糧價，才穩住人心，然風潮雖過，隱患猶存，爲了得以掌控糧食問題，中共遂有重行使用糧票之議。

中共糧食總產量四十餘年來是有相當地成長，唯因人口亦翻了一番多，因此仍有糧食的壓力問題，每年尚須從國外進口若干糧食，目前大致可以解決十二億人的溫飽問題，未來發展前景卻不容樂觀。

改革開放以來，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農民勞動的積極性，糧食產量才有大幅度的增長，「從一九七九年的三〇七四·五億公斤增到一九八九年的四〇七四·五億公斤」，^{②①}其間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連續四年陷於徘徊的局面，一九九三年糧食總產量達四五六四·四億公斤，公元二〇〇〇年冀望能達五〇〇〇億公斤。然而，在糧食生產方面存在着以下問題：一、人地比例失調；二、耕地質量衰竭；三、農業投入不足；四、「剪刀差」擴大；五、農業推廣隊伍不穩；六、種糧風險逐年增大。^{②②}這些不利因素影響了大陸未來糧食的生產形勢。

在人口日增和耕地日減的情勢下，科學家們已得出以下結論：^{②③}

在本世紀及下一世紀初，人均糧食產量不會超過一九八四年的水平，大致上七〇〇——七五〇斤左右，甚至有可能在七〇〇斤以下。……今後三十年到四十年，糧食需求遠遠大於供給是大陸糧食市場的基本格局。到二〇〇〇年，大陸糧食總需求爲〇·六八億斤，糧食總供給量（加上進口糧一五〇——七五〇億公斤）在四九二五——五五〇〇億公斤，供求缺口爲一三〇〇——一八五〇億公斤，到二〇二〇年，大陸糧食總需求爲〇·九萬億公斤，總供給量（加上進口糧食二五〇億公斤）〇·六一五萬億公斤，缺口二八五〇億公斤，糧食長期短缺產生如下問題：一是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糧價上漲趨勢不可避免。二是政府對城鎮居民的多類財政補貼負擔愈來愈重，將由目前的三〇〇多億增加到上千億元；三是目前實行的糧價政策，有可能出現農民拒絕納糧或拖欠交糧的情形。

大陸的糧食問題到下世紀的二十年代，將更形嚴重，屆時人口數量將達十五億之衆，而人均糧食種植面積卻下降到不足一畝，如何解決十五億人的吃飯問題？

爲了解決糧食問題，浙江省委會組織專家對該省糧食生產、流通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提出了「糧食十策」，即第一，各級政府，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真正牢固樹立糧食是基礎觀念和憂患意識，踏踏實實抓農業；第二，建立永久性基本農田保護制度；第三，推進適度規模經營，提高糧食生產集約化水平，更好地向深度和廣度擴展；第四，搞好糧食種植結構調整；第五，

②① 龍緒豪，「九十年代我國糧食生產的展望及戰略選擇」，財經科學，一九九二年第二期，頁一四。

②② 彭珂珊，「二十一世紀中國糧食再上新台階的新思路」，農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四年九月號，頁三三——三三。

②③ 汪洋著，中國八億人，頁三一——三二。

提高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價值，逐步發展農、工、貿一體化；第六，處理好農業和鄉鎮企業的關係；第七，加強對科技農業的領導，提高農業生產現代化水平；第八，進一步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完善糧食購

35	90/78
3	1.20
8	0.39
6	1.938

提高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價值，逐步發展農、工、貿一體化；第六，處理好農業和鄉鎮企業的關係；第七，加強對科技農業的領導，提高農業生產現代化水平；第八，進一步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完善糧食購銷體制；第九，糧食價格既要開放，又要管理；第十，一要吃飯，二要建設。②④「無糧則亂」這是從中國歷史所得出的定律，大陸目前雖大致可解決糧食的問題，然在糧食生產各項條件日益惡化的情況下，而人口增長的勢頭仍很強勁，大陸未來的糧食壓力將與日俱增，大陸社會能否穩定將面臨嚴峻地考驗。

肆、大陸農村的勞動力

中國大陸的人口數量，四十餘年來翻了一番多，根據中共四次人口普查的結果，一九四九年有五億四千多萬，一九五四年為六億，一九六四年為七億，一九六九年為八億，一九七四年為九億，一九八一年達十億，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四日突破十一億，估計在一九九四年將達十二億，未來人口發展的勢頭仍未稍減。

在這十二億的人口，農業人口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目前已高達九億數千萬人，而目前的計劃生育工作，在農村推行的成效又不彰，每年新增的一千六百多萬人口，絕大多數都在農村，這種發展趨勢導致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日趨嚴重。

以往中共採取若干政策，特別是戶籍制度，在城鎮之外築起了一道「籬笆」，大量農村的勞動力因而無法進入城鎮，將農村視為是一塊吸收剩餘勞動力的巨大「海綿」。事實上，隨着大陸耕地面積逐年縮小，勞動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農村早已失去吸收剩餘勞動力的能力，成一塊吸水過多，飽滿欲溢的「海綿」，農村早已出現了剩餘勞動力，②⑤所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是指「邊際農業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也即如果將農業中這部份勞動力轉移出去，農業總產量也不會減少，甚至略有增加，即使是不增加任何其它要素投入。這一部份勞力形式上是就業，但實際上對農業生產並不能發揮任何作用」。②⑥大陸農業勞動力見（表五）。

②④ 沈民建，「糧食十策」，杭州：浙江經濟報，一九九四年六月廿一日。
 ②⑤ 魯志強著，人口問題與發展戰略決策，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頁一四七—一四八。
 ②⑥ 朱鏡德，「關於農業剩餘勞動力問題的思考」，學習與探索，哈爾濱：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一九九〇年第一期，頁九五。

當前中國大陸農村形勢的探討

表五 中國農業勞動力

項	目	1965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90/65	90/78
勞動力數	占有	23732	28313	28629	29117	29771	30853	31145	30862	31105	31212	31614	32197	33170	34049	1.43	1.20
	實耗	20142	19840	18998	19124	17497	16820	16556	16518	16205	16381	16611	16902	17283	17672	0.88	0.39
(萬人)	剩餘	3590	8473	9631	10993	12274	14033	14589	14344	14900	14930	15003	15295	15887	16377	4.56	1.93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79—199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四十餘年來，大陸農村農業勞動力 and 耕地面積之間的矛盾是日趨嚴重。五十年代初，大陸農業勞動力約為一·六億，耕地總面積為一·五九億畝，勞均耕地面積約十畝，在當時的生產水平下，大陸農業就已經出現了勞力剩餘問題。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六年，大陸耕地面積減少了九千萬畝，而農業勞動力卻從一·六億增長到三·七九億，從而使勞均耕地面積大為減少，現已不足五畝。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止於此。「二〇〇〇年的中國」研究組在其報告中指出，即使按有關人口增長的低方案（總人口不突破十二億）預測，到本世紀末，大陸農業勞動力總數仍將達到四·九六億。根據國家現代化發展規劃，大陸農業至多只能容納一·六億勞力，即勞均耕地面積維持在五十年代初的水平，而要實現這一低水平目標，到本世紀末就必須將多達三億以上的勞力轉移出來。²⁷事實上，大陸人口總數在一九九四年即已達十二億，而耕地面積在最近五年中則減少了六千萬畝，「一九八八年大陸農業生產性勞動系數為百分之五十六點二，剩餘勞動率為百分之四十三點八」，²⁸顯示出大陸農業勞動力之中，有將近一半的人為剩餘勞動力，未來的發展前景亦不容樂觀，剩餘勞動力的數量越多，人均所得越少，農民生活品質越難改善，生活越困難，繼而降低了積累率，農業發展的步伐更將滯緩。

如何轉移數量如此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確實成為中共當局相當重視且棘手的問題。早在一九五二年，中共中央的勞動就業委員會即制定頒佈了關於如何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的方針與政策，然而實際上，非但沒有解決此一問題，反而使問題益趨嚴重，直到改革開放政策推行以來，大陸農村剩餘勞動力才出現盛況空前的轉移，其間推行延續相當長久的時間。從中共國家勞動部提供的數據中顯示，八十年代的十年間，大陸農轉非的人口年均四百多萬，一九八四和八五年，農業勞動力轉移人數平均高達一千八百萬。雖然經過長期改革政策的推動，試圖改善此一情況，仍未能扭轉大陸農業人口和農業勞動力持續增長的勢頭。一九七九年，大陸農業人口為八·一億，其中農業勞力三·一億；至一九八六年，農業人口已增到八·四八億，農業勞力也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了六千九百萬。目前，大陸農業勞力仍在以每年一千多萬人的速度遞增。即使今後能夠在農村成功地實行計劃生育，使農業人口年均自然增加數由目前的一千多萬減少到五百萬，其效果也只能在十六年後表現出來（因為農業勞動力再生產大致有十六年周期）。假定大陸農業勞力今後每年能夠轉移一千八百萬，那麼，要使大陸勞均耕地面積恢復到五十年代初的水平，至少也需要三十年以上的時間。²⁹

探討造成大陸農業勞動力劇增的主要原因，一是毛澤東錯誤的人口政策，他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又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

²⁷ 同前註，頁九六。

²⁸ 汪洋著，中國八億人，海口：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頁五四。

²⁹ 同註一。

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³⁰二是以往中共將城市無法安排工作的人員，下放到農村，三年大饑荒後，中

- ②7 同前註，頁九六。
②8 汪洋著，中國八億人，海口：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頁五四。
②9 同註一。

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②8}二是以往中共將城市無法安排工作的人員，下放到農村，三年大饑荒後，中共將二千萬城市居民趕出城市；「文革」期間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連續十三年，也有二千萬名城市知青被下放到農村。

在人民公社未廢除前，農村上億的剩餘勞動力均被安置在公社中享用「大鍋飯」，改革開放政策推行以來，隨着鄉鎮企業的發展，人民公社的廢除，以及中共規定農民可以自籌資金，自謀糧食到城鎮發展等因素，導致數以千萬計在農村生活不易的農民，從鄉村向城市，從內陸向沿海流動，形成一股所謂「東西南北中，發財往外衝」的盲流浪潮，一時之間，大陸各大城市無人不滿為患，紛紛告急，迫使中共國務院一再發出緊急通知，企圖堵住這股浪潮。然而整體觀之，如果農村整體的生產條件無法改善，這股浪潮的源頭勢將日益增強，一旦大陸經濟形勢有變，數以千萬的盲流，對大陸社會的穩定必定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伍、鄉鎮企業的現況與發展

由原來人民公社中的社隊企業蛻變出來的鄉鎮企業，在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社會中異軍突起，大放異彩，但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並在農業工業化和國家現代化方面起着關鍵的作用」。^{③0}據中共「新華社」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報導，一九九二年百分之五十一新增的總產值、百分之六十八新增稅收、百分之六十一新增的農民平均收入，都是來自鄉鎮企業，同時鄉鎮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大陸工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一，一九九三年則將提高到四成以上。^{③1}從鄉鎮企業目前所起的作用，中共已視其為解決農村根本問題的手段，鄉鎮企業未來的發展對大陸整體經濟，以及農村的穩定程度，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鄉鎮企業是指「由大陸農民興辦以從事商品生產、交換、服務活動的盈利性經濟組織」。^{③2}改革開放這十餘年來，鄉鎮企業的數量增長迅速，從一九八七年的一百餘萬家，猛增至一九九四年的八千八百六十餘萬家；職工的人數由於一九七八年的二千八百餘萬，增至目前超過一億，總產值由一九七八年的五百多億元，到一九九一年突破一兆元。發展勢頭相當強勁，

③0 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遺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頁一五二四—一五二六。

③1 林青松、威廉·伯恩合編，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二十二。

③2 經濟日報，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③3 中國鄉鎮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北京：農業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一。

中共農業部鄉鎮企業局長齊景發指出：一九九四年一至六月份，全國鄉村工業累計實現產值一·二億萬元，比一九九三年同期增長四十四·八%，銷售產值一萬億元，比一九九三年同期增長五十五·二%。到五月底，鄉鎮企業共上繳國家稅金五百九十六億元，比一九九三年同期增加三十五%。發展的速度一九九四上半年一直在四十至五十%左右。³⁴至於鄉鎮企業之所以能維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其主要原因在於：

一、黨中央、國務院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十分關心中西部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
二、地方各級政府把發展鄉鎮企業作為增加地方財政、增加農民收入、支持農村各項事業的重要途徑，從各方面給與幫助和支持。

三、多數鄉鎮企業經過十多年的改造和提高，自身已具有一定生產能力和管理水平。³⁵

鄉鎮企業對大陸總體經濟的貢獻大致可歸納以下幾點：

- 一、成為國家財政稅收的重要來源。
- 二、可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
- 三、支援地方建設和農業發展。
- 四、外銷商品，增加出口創匯。
- 五、調整商業結構。
- 六、有助於大陸經濟的改革。

雖然大陸鄉鎮企業這十餘年來發展迅速，貢獻亦相當顯著，但是在其內外兩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³⁶
內部問題包括：

一、人才問題。既缺乏管理人才，又缺乏技術人才，管理幹部都來自「農村幹部」，不僅年齡結構偏高，而且文化程度低，專業知識少，很不適應鄉鎮企業發展的要求，技術人員非常少，技術水平也極有限，在大陸一千多萬家鄉鎮企業中，技術人員只占萬分之九，工人文化水平低，勞動熟練程度也相當差，反映在生產上，產品結構簡單，包裝落後，成本高昂，競爭力弱。

二、技術和設備問題。大部份鄉鎮企業購買的都是國營事業淘汰的老機器，生產能力低，產品質量難以保證，開發新產

³⁴ 傅雪柳、魏小兵、趙鋒，「亦喜亦憂的中國鄉鎮企業」，北京：瞭望新聞周刊，第三十五期，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頁十二。

³⁵ 同前註。

³⁶ 董杰、蔡志強、管文浩著，盲流，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七月，頁一七〇、一七一。

品的能力很弱。

外部問題包括：

一、市場問題：鄉鎮企業面臨的是一個不開放的生產要素市場，在資金、能源、原材料上不能享受國家計劃價格的優惠，往往在高消耗的同時付出比國營企業高很多的生產成本。

二、政策問題：有些地方領導人對鄉鎮企業發展的認識還很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鄉鎮企業的發展。

三、地方行政部門對鄉鎮企業的管理包括承包人員的選拔不給其自主權，且又讓鄉鎮企業承擔過於沉重的社會負擔，束縛了鄉鎮企業的手腳。

鄉鎮企業除自身經營面臨的問題外，同時對大陸生態環境也帶來了以下不小的衝擊：

一、占用耕地：鄉鎮企業的廠房用地都是占用耕地，這是近年來大陸耕地面積銳減的主因之一，這將影響糧食的生產。

二、浪費能源：不少鄉鎮企業因設備陳舊，耗能量高，這將使工業效率進一步下降。

三、污染環境：鄉鎮企業產生的「三廢」，在一九九〇年的調查是：排放廢水十八·六億噸，占全國工業廢水排放總量的六·七%；排放廢氣一·二二億標立方米，占全國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的十二·九%；廢渣產生量為一·一五億噸，占全國工業廢渣產生總量的十六%。³⁷

無疑地，鄉鎮企業的崛起對大陸經濟的發展，以及大陸社會的穩定是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因本身基礎相當脆弱，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其生存，例如：一九八九年中共經濟的緊縮政策，即導致當年上半年全大陸有三千六百家鄉鎮企業因而倒閉，一千多萬農民不得不「棄甲歸田」。³⁸未來中共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以及經常和美國貿易的摩擦，都會對大陸鄉鎮企業造成衝擊。後鄧時期中國大陸社會的穩定程度是與鄉鎮企業的發展情況密切相關的。

陸、農民的收入與負擔

收入是生活依靠的基礎，整體經驗的發展狀況決定了收入的高低，各個行業彼此的收入也有不同，成長的變化和稅賦的高低等因素則影響了實際的收入。

改革開放前大陸的經濟長期陷於停滯狀態，因此一般人民的收入普遍低下，鄧小平說：「我們幹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

³⁷ 同註四，頁十三。

³⁸ 同註四，頁二〇六。

義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似處於貧困狀態。³⁹一九七八年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三百一十六元，農民人均純收入一百三十四元。改革開放以來，隨着農村改革的深入發展，多年被壓抑的生產力得到解放，農村的經濟發展相當迅速，農民的收入亦隨之而增加，農民人均純收入在一九八五年為三百九十八元，⁴⁰比一九七八年增長近七倍。然而，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卻低於生產增長的幅度，甚至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還出現負成長的現象。

由於農業本身特質的限制，其與其它行業的比較，經濟效益不可能很高。從一九八五年以來大陸農村勞動日收入來看，種植業只有四元左右，農副產品加工業為五元，建築業為七元，商業、飲食業為十二元，運輸業為十六元。另據河南省統計資料顯示，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在農村各產業中勞動農業收入最低，農、工、運、建、服（商業、飲食）各業的勞動人均收入之比為一：七·五八：六·四一：二·四〇：五·七〇；在農業內部，漁業經濟效益最高，其它各業經濟效益較低。農、林、牧、副、漁業百元物質消耗的收益為一：〇·九三：〇·四七：〇·六二：一·三一；在種植業內部，自一九八五年以來，糧食在六類農作物（糧食、棉花、油料、紅麻、蔬菜、烤煙）中畝盈利和成本營利一直最低，成本營利率為一：三·〇九：三·二四：二·五七：二·〇八：一·一八。⁴¹顯示了農業、種植業、糧食在諸產業中比較效益是最低的。

農民在收入方面一直是處在最低的位置，但在負擔方面卻是陷於過重的處境。其原因在於：一是現代化、工業化過程的資本累積對農民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二是體制變遷的某種無序性使農民處於不利地位；三是國家有關政策在具體實行過程中未能充份起到保護農業和農民利益的作用；四是法制不健全，執法不嚴格。⁴²

農民的稅賦包括農業稅、集體提留和地方基層的集資攤派等三方面。從一九八五年以來，中共國務院雖一再強調農民的負擔要控制在上年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以內，然實際上都是超過且在持續成長中，「按照中共農業部的資料，一九九一年農民每年繳稅四十九·四元，比八〇年增長了一倍。中共國家統計局調查結果，一九九〇年農民負擔的農業稅與集體集留，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及百分之二十一·三。九一年又比九〇年增長百分之十·四，大大高於純收入的百分之十一，有的地方甚至達到百分之三十。」⁴³

農業稅的負擔對農民而言還不算重，最讓農民難於負擔的是名目繁多的集資、攤派、統籌……等苛捐雜稅。根據在四川

³⁹ 鄧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頁十、十一。

⁴⁰ 李若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時空特徵分析」，農業經濟問題，北京：中國農業經濟學會，一九九四年第六期，頁十三。

⁴¹ 古文曉，「關於發展我國農村經濟根本出路的思考」，農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四年第九期，頁一五五。

⁴² 彭劍良，「農民負擔過重的深層原因及其解決途徑」，光明日報，一九九三年九月廿二日。

⁴³ 吳國光、王兆軍合著，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九四年三月，頁一四九。

農村實地調查，某市（縣級）十六個部門，自查自報的行政事業項目有二百一十二項，其中中央的有廿三項，省級的有五十六項。收費較多的農、牧、漁業為七十六項，農機水電局七十項，交通局十四項，計劃生育部門十三項，真是「千隻手，萬

④ 農民負擔過重的原因及其解決途徑，光明日報，一九九三年九月廿二日。
⑤ 吳國光、王兆軍合著，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九四年三月，頁一四九。

農村實地調查，某市（縣級）十六個部門，自查自報的行政事業項目有二百一十二項，其中中央的有廿三項，省級的有五十六項。收費較多的農、牧、漁業為七十六項，農機水電局七十項，交通局十四項，計劃生育部門十三項，真是一千隻手，萬隻手，齊向農民來伸手，農民都是唐僧肉，誰都想來啃一口，除了這些明文規定的費用外，還有不少的難以估算的隱形負擔，加上名目數不清的「三亂」（亂集資、亂收費、亂攤派），更使農民叫苦不已，收費的手段也無奇不有，農民不得不拿錢，收費手段行政化。④農民說：「四隻金錢豹（指財政、稅務、工商、銀行），十三頂大蓋帽（指有制服的單位），都來吃一頂破草帽（指農民）」。農民的感受亦可由下面這副對聯反映出來，上聯：「你集我集他集農民急」，下聯：「你等我等他們農民愁」，橫批：「大口喘氣」。

當前農民反應該強烈的負擔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 一、公糧補差價。
- 二、農資攤派款。
- 三、集資、保險款。
- 四、強行要贊助，胡亂收稅費。
- 五、收款次數頻繁。⑤由於負擔沉重，農民常因無法繳納而自殺的事件時有所聞，⑥同時也導致農村幹群關係的日趨緊張，甚至出現一九九三年十月日四川仁壽縣的農民抗暴事件。

柒、黨群與幹群關係

大陸農村的黨群與幹群關係是具體顯示中共政權穩定程度的一種表現，中共的村幹部是日常生活中實際和農民群眾接觸的基層人員，這些基層成員包括村黨支部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村經濟合作社社長、村團支部書記、民兵連長、婦代會主任等，全大陸村幹部大約有八百萬人左右，他們是大陸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具體組織者和直接管理者，是黨和政府聯繫農民群眾的橋樑和紐帶。他們具有亦「官」亦民的身份，中共各項政策要在農村落實，都是由他們負責推行，因此，他們的工作範圍廣，工作量大，工作難度大，夾在上級單位和農民群眾之間，常使他們處在「裡外不是人」的困境，以致他

④ 孫公理，「四川農村實況調查：苛稅如猛虎」，香港：當代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頁八十八、八十一。

⑤ 樊海山，「大陸農民負擔過重」，香港：鏡報月刊，一九九三年五月號，頁五十二、五十三。

⑥ 蘇開，「農民負擔愛思錄」，共產黨員，瀋陽：中共遼寧省委共產黨員雜誌社，一九九三年二月號，頁廿六、廿七。

當前中國大陸農村形勢的探討

們的心靈相當困惑。^{④7}

他們之中雖然也有一些真正能為民服務者，但絕大多是欺壓榨取農民群眾者，中共政權成立後，隨着中共對大陸社會控制益趨嚴密，以及機構的不斷膨脹，基層幹部的人數也日益增長，官員和人口的比例，在中共當政初期，是二九四人養一個幹部，現在是二十四人就得養活一個官員。^{④8}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掀起了「向錢看」的風氣，在這股風潮的吹襲下，大部分中共的黨員幹部，特別是基層人員，都逐漸的腐化變質，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已大不如前，人民公社解散後，又失去了吃「大鍋飯」和從集體組織撈取好處的機會，因此無心於自己負責的日常工作，而將注意力轉向在農民身上的榨取，使中共農村的黨組織陷於癱瘓無力的狀態，導致「群眾的願望得不到實現，群眾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裡黨的基層組織就沒有威信，說話沒人聽，辦事沒人支持，黨的路線政策也得不到落實。……情況嚴重的地方，黨的基層組織形同虛設，有的基層組織的幹部以權謀私，欺壓群眾，魚肉鄉民」。^{④9}黨群關係與幹群關係問題日趨惡化，致使一九九四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冀望藉此得以改善這種嚴重情況。

大陸農村經濟的發展狀況實與該地中共黨組織和黨員有密切的關係，農民們如是說：「農村富不富，全靠黨支部」，由此可見一斑。目前大陸農村地區，中共黨組織和黨員關係的具體情形為何，據一些省份的農村問卷調查顯示，百分之三十三左右的群眾認為農村黨組織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黨群關係比較緊張。主要原因有四：一是一些支部黨員年齡偏大，文化素質低，缺乏市場經濟所需具備的文化科學知識和經營知識，致富無門。有些村的黨員平均年齡都在五十歲以上，個別村還有在六十歲以上的，三十歲以下的黨員比例很小。二是一些幹部作風霸道，搞一言堂，家天下，造成農民對幹部的不信任和對立情緒，影響了黨群關係。三是一些幹部貪污腐化，侵吞集體財產。有的地區農村吃喝招待一年費用要佔村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有個千人大左右的低收入村，村年收入二、四萬元，九四年新支部書記上任半年（一至六月）竟吃掉了七千元。四是組織工作不健全，一部分支部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相當數量的農村經濟聯合體、集體企業沒有黨組織，使黨對基層的經濟工作不能有效地起領導、監督、保證作用。個別地方竟在村黨員活動中心擺上神像，把黨員活動陣地變成了封建迷信場所。^{⑤0}從若干農村實際調查得到的結果顯示，農村的黨群和幹群關係日趨疏離惡化，而這種「裂痕現象」又朝向以下幾個方面

④7 葛志華，「村幹部論」，社會月刊，一九九一年第六期，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主辦，頁八〇—一〇。

④8 吳國光、王兆軍合著，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台北：世界書局發行，一九九四年三月，頁一五五。

④9 莫如，「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北京：瞭望新聞周刊，第四十二期，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頁一。

⑤0 馬小林，「農民有四盼」，北京：瞭望新聞周刊，第一期，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日，頁一〇—十一。

發展：一是雙方抵觸情緒趨於激化；二是暗中報復日趨增多；三是以法對法意識增長；四是裂痕向深層擴展。^{⑤1}

④ 莫如，「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北京：瞭望新聞周刊，第四十二期，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頁一。
⑤ 馬小林，「農民有四盼」，北京：瞭望新聞周刊，第一期，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日，頁一〇—十一。

發展：一是雙方抵觸情緒趨於激化；二是暗中報復日趨增多；三是以法對法意識增長；四是裂痕向深層擴展。^①

中共在農村推行的各項政策中，最主要的工作項目亦即難度最大的，就是合同定購糧、徵收各類項目費用及計畫生育，使農民群衆最感不滿，也是目前激化農村幹群之間矛盾的焦點所在，大陸農民稱呼幹部爲「三要」幹部，即要糧、要錢、要「命」——糧，就是合同定購糧；錢，包括農業稅、國庫券在內的各項稅費和提留；「命」，是指計畫生育。還給區、鄉、村的幹部們送了個綽號：「糧」書記，「錢」鄉長，「刀」主任。許多順口溜充分且生動地反映出目前大陸農村黨群、幹群關係的緊張局面，諸如：「幹部進了村，戶戶關門聲」、「幹部進了村，雞犬都不寧」。^②另有一首順口溜，也反映了中共幹部對農民壓榨和農民對幹部厭惡的情景，其間所產生之後果實不難想像，常言道：「誰的手最長？幹部手最長；誰的肉好吃？群衆肉好吃；誰家人可鄙？領導最可鄙……」

這種黨群、幹群關係的緊張形勢，使大陸農民表示，目前他們最缺乏的是「陳勝、吳廣」類型的人物，並且懷念李自成，希望去給李自成掃墓。一旦大陸情勢發生變化，這種黨群與幹群之間矛盾對立關係，能否使中共政權仍舊維持穩定確實是個變數。

捌、農村社會的治安問題

政權成立後，中共在強化對大陸社會掌控所採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將介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社會上運作的各種組織，諸如宗教、行會、政黨、宗教組織和黑社會組織等，不是加以剷除，就是予以控制。因此，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大陸各地的宗族組織和黑社會組織等大致全被剷除，而爲對外顯示維護「民主」和「宗教自由」的假象，繼續讓其存在的八大民主黨派和各種宗教組織，則完全加以控制，同時又將大陸每一個人編入各種單位組織之中，形成了強國家弱社會，只有單位沒有社會的社會型態。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風氣的轉變，中共黨政幹部的腐化及對社會控制能力下降等因素，大陸社會治安逐漸惡化，車匪路霸橫行無阻，農村宗教迷信和宗族勢力復活，黑社會的各種地下幫會又重新崛起，對中共政權的穩定，造成嚴重的威脅。

① 王宗儒，「危險的裂痕：農村黨群關係疏離——湖北省鍾祥縣黨群關係調查」，社會，北京：上海大學文學院主辦，一九九〇年二月號，頁九—一〇。另王習加撰，「農村幹群關係何以如此緊張」一文，載社會，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號，頁十八—十九。指出其原因有五：(1)難得糊塗的農村財務；(2)廣爲盛行的「攤派風」；(3)年復一年的農產品「賣雞」；(4)錯綜複雜的「宗族網」；(5)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

② 崔頌，(新華社記者)，「『三要』，農村幹群矛盾的焦點」，內參選編，一九八八年第十九期，新華通訊社，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日，頁十二—十四。

治安問題：據大陸某權威研究機構進行的一項調查報告稱：當前大陸人民最不滿的是社會治安嚴重惡化。被調查的對象有百分之九十七感到沒有起碼的安全保障。⁵³從一九八七年以來，大陸正處於第三次大的犯罪高潮期，當年的犯罪總發案率為萬分之六點七四一，比一九八四年的萬分之四點九九一上升許多，一九八八年繼續上升到萬分之七點六六，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全大陸刑事案件立案數量比一九八八年同期上升一點四七倍，其中重大刑事案件比一九八八年同期上升一點三六倍，⁵⁴到一九九〇年，全大陸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的各類刑事案件有二二一·六萬餘起，比一九八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點四；一九九一年全大陸刑事案件立案數又比一九九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達到二二六萬餘起；一九九二年仍居高不下。一九九三年春季全大陸再次嚴打「車匪路霸」之後，一些重大刑案如殺人、搶劫等犯罪活動在華東沿海富庶地區仍大幅上升，如江蘇省一九九三年一至四月份的重特大刑事案件達到二一七起。⁵⁵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曾透露，大陸上刑事案件呈現下列五大特點：一、團伙犯罪增多。犯罪團伙在鐵路交通線上進行搶劫、盜竊，形成所謂「車匪路霸」。二、重大暴力犯罪增多，搶劫銀行、商店、出租汽車的案件時有發生。三、集團鬧事和宗族械鬥事件嚴重。四、賣淫嫖娼、販毒吸毒、拐賣婦女等六害危害甚烈。⁵⁶由於社會治安日益惡化，使大陸許多村子，經常發生夜晚返家途中被劫掠的事件，尤其是女性同胞們更是夜不出戶，自我保全防衛以免惹禍上身，農民們意識到刑事案件的推陳出新、變本加厲，引起對生活的恐懼感與不安定，也因此對社會治安的改善盼望更形殷切。

黑社會組織：近年來，大陸社會治安的敗壞與大陸黑社會組織的復活有密切關係。改革開放以來，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幫會組織發展極為迅速，已形成了有組織、有綱領、有計畫地行動，操縱一些地區街道、單位、農村的活動，有的還擁有巨額貨幣、交通車輛，甚至武器。一九九〇年，全大陸查獲犯罪團伙一〇〇五二七個；成員三六八八八五人。團伙數和團伙成員數均比一九八五年增加兩倍多。⁵⁷這些黑社會組織具有以下五個特點：一、分布廣泛，並由農村向城市蔓延、擴展；二、成員構成複雜，大都是低齡、無業、品劣的青少年；三、內部組織嚴密，等級制度森嚴；四、由經濟上侵財到政治上的反動；五、作案群體化，頻率高，帶恐怖性。其造成的危害，首先是危及社會安定，其次是動搖基層政權，第三是腐蝕年輕一代。

- ⁵³ 陳實，「各階層均有犯罪傾向，大陸社會治安嚴重惡化」，香港：當代月刊，一九九四年十月號，頁七十八。
- ⁵⁴ 谷書堂主編，我國當前社會問題選視及治理方案，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頁二五七。
- ⁵⁵ 吳志鴻，「中國人的安全正被猖狂吞噬」，社會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九年第六期，頁六七。
- ⁵⁶ 何頻、王兆軍著，中國大陸黑社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七月，頁一二。
- ⁵⁷ 孫輝、吳孟控，「警惕黑社會勢力滋長！」，社會，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一九九二年十月號，頁四七。
- ⁵⁸ 王光明、劉文凱，「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社會，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號，頁一八一—一八二。

在大陸黑社會勢力迅速蔓延的同時，台、港的黑社會組織也向大陸滲透，已成爲當前的一大公害，一大毒瘤，中共國務院相當重視此一問題，一九九四年八月初曾召開「全國反黑工作會議」。中共公安部部長賈春旺在會上透露，黑社會組織在

⑤7 孫輝、吳孟控，「警惕黑社會勢力滋長！」，社會，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一九九二年十月號，頁四七。
⑤8 王光明、劉文凱，「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社會，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號，頁一八一—一九。

在大陸黑社會勢力迅速蔓延的同時，台、港的黑社會組織也向大陸滲透，已成爲當前的一大公害，一大毒瘤，中共國務院相當重視此一問題，一九九四年八月初曾召開「全國反黑工作會議」。中共國安部部長賈春旺在會上透露，黑社會組織在中共內部活動滲透幾乎已到無孔不入的情況：一、滲透到部分黨、政部門，包括省、廳一級黨政機關部門；二、滲透到公安、司法系統的一些部門，包括擴展到一些機關的核心領導層；三、滲透、擴展到工商、外貿、交通、金融等主要經濟部門；四、滲透到中資在香港、澳門和東南亞等工商、貿易機構，甚至中資在日本、歐洲的部門；五、滲透、擴展到中國在外留學生，在海外工作的華人和移民中。⑤9中共公安部長陶駟駒亦在發言中指出類似的情況。由此顯示，大陸黑社會組織的死灰復燃，及其勢力的迅速蔓延，已對中共政權的穩定構成了相當大的威脅。

農村的宗族勢力和迷信：由於在農村的中共黨政機關形同虛設，加上農民家庭作爲生產主體以後，對黨政組織和幹部的依賴性減弱，導致「家族和血親力量以其天然的凝聚力首先在一個農村復興。續家譜，修祖墳，認宗親在許多地方出現，家族對家族成員起着重要的保護作用，並規範家族成員的行爲。宗族恢復得也很迅速」，⑥0這些宗族勢力的興起，對當地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時而與中共的黨政組織形成磨擦。此外，近年來大陸農村也掀起了「一股迷信的熱潮，各地造廟熱如火如荼，求神拜佛的大軍日益壯大，算命、看相在城鄉公開設攤，迷信品市場也日趨繁榮，利用迷信騙財害命的事件，時有所聞，⑥1各種宗教組織的活動日漸頻繁活絡，信徒與教徒的人數亦日漸增多。這些地方社會勢力的擴展，在在弱化了中共在農村地區的控制力量及有效性。

玖、結 論

人云：不瞭解中國農村，就無法瞭解中國。中國的問題，基本上是農村的問題，中國歷代的治亂興衰，無不與農村社會的穩定程度密切相關，而農村社會能否穩定，則端視農民是否有飯吃。中國「飯」字的結構，極恰當地顯示此一哲理，「飯」字是由兩邊份量相等的「食」和「反」所構成，當「食」的一邊越擴展，「反」的一邊就相對地縮小，社會的穩定性高。反之，如果「反」的一邊越擴展，「食」的一邊就相對縮小，社會即開始出現動盪現象，到了完全沒有吃的，老百姓就會造反，此乃「民無食必反」的哲理，鄧小平說：「不管天下發生什麼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⑥2

⑤9 羅冰，「黑社會滲入黨政機關」，爭鳴，香港：爭鳴月刊社，一九九四年九月號，頁一四—一五。

⑥0 王曉毅、楊偉民，「淺談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的整合」，新華文摘，北京：新華文摘社，一九九一年七月號，頁一四—一五。

⑥1 黃健全，「玄色衝擊波——當代迷信問題掃描」，社會，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一九九一年八月號，頁三九—四一。

⑥2 鄧小平，「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頁三六一。

從鄧小平的講話中，顯示出他對此一哲理的高度認知，他說：「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⑬所以多次提出強調「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

鄧小平雖一再指示，強調農業的重要性，然中共四十餘年來的實際作為卻背道而馳，農業一直並未給予應有的重視，農民生活亦始終未見改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陸農業雖一度有所發展，農民生活略見改善，但自一九八五年來，農業又遭忽視，城鄉差距愈拉愈大，整個農業生產形勢日趨惡化，然而，大陸人口每年又新增一千六百萬，人口與糧食的矛盾將益形緊張，大陸社會能否在鄧後仍維持穩定，關鍵仍然在於大陸的農業能否發展，農村的各項問題能否解決。從以上的分析，影響大陸農村形勢發展的各項因素，存在着不少不易解決的問題，大陸社會未來的穩定實不容樂觀。

⑬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六十五。